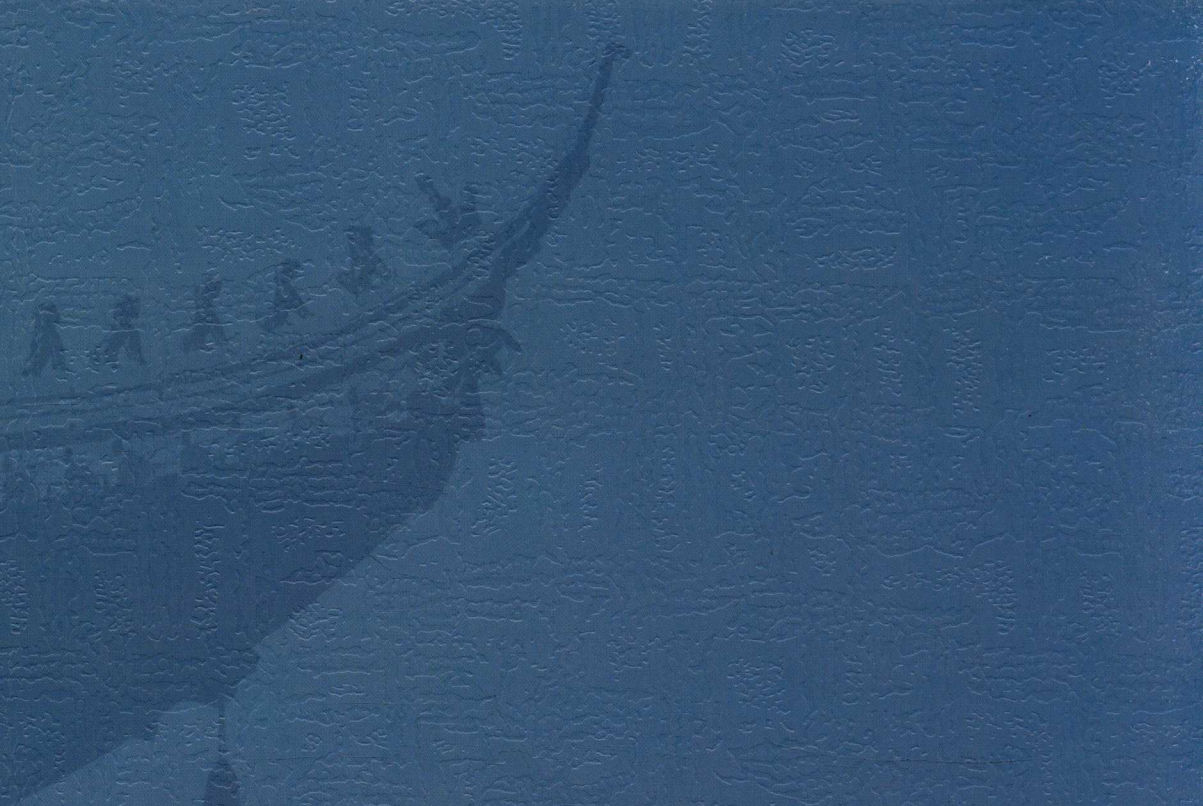




中国视角：

当代经验和古典观念之间

韩德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视角： 当代经验和古典观念之间

韩德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视角:当代经验和古典观念之间/韩德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161-8237-6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82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语言大学
重大专项课题（13ZDJ03）前期成果



作者和母亲2000年10月在故宫。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母亲！

目 录

第一编 当代经验的文学视像

- 一 从救世到混世的精神流变
——柯云路、张承志、徐星、王朔纵横谈 (3)
- 二 新时期小说创作人道主义倾向的逻辑展开与形式转换 (16)
- 三 新时期小说文本试验哲学—社会学规定性的考察 (25)
- 四 逆子·狂人·无赖
——关于个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悲剧命运的思考 (38)

第二编 世纪之交多元文化空间的反思

- 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多元特征 (57)
- 二 改革与反对官僚主义 (69)
- 三 “意象学三书”与当代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 (78)
- 四 传统文化的危机与 20 世纪中国的反文化思潮 (94)

第三编 古典观念的回溯

- 一 论儒学的“哲学的突破” (121)
- 二 前期儒家的生命哲学 (138)
- 三 说“名节” (159)
- 四 庄子生命哲学述论 (166)

五 艺术的否定与否定的艺术 ——庄子美学的逻辑走向	(193)
六 “游”：“君子”和“至人”之间的张力及其释放	(207)

第四编 传统伦理的现实可能性

一 “和”：如何实现从“天下”向现代政治国家的转移	(217)
二 《周易》管理思想试探	(222)
三 《孟子》四题	(235)
四 生态伦理观：儒家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诠释	(247)
五 “义”：从“五伦”“三纲”到现代职业伦理	(271)
后记	(303)

第一编

当代经验的文学视像

一 从救世到混世的精神流变

——柯云路、张承志、徐星、王朔纵横谈

提要：小说是历史记录的心理阐释和细节补充。全景式地扫描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画廊，我们注意到柯云路、张承志、徐星、王朔四位似乎风格旨趣迥异的作家，对于观照时代精神演化轨迹之曲折及当代社会心理意识之复杂所昭示的特殊象征意义。任何有关中国社会变革与目标指向的方案设计，都应该把对这种曲折性和复杂性的悉心体会，作为建构和现实实践进程之积极互动关系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社会心态；小说；理想主义；虚无主义

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扭曲的时代，一个痛苦的时代。错位，缠绕，难以解说的矛盾；希望，绝望，无法逃脱的煎熬。狂澜与潜流起伏消长，奔流共回旋翻腾纠葛。探求当代文化精神的切实走向和出路，我们或许会陷入迷宫样的纷纭现象而莫衷一是。任何特定角度、特定层次的描述，都不可能排除局部性的困囿，但终究，这是切入社会心态深层的必要准备，也是归纳、总结丰富的意识现象，包括文学艺术现象的基本手段之一。

柯云路的名字是和“李向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柯氏意图通过《新星》对一个县的微观解剖，和《京都》对首都，也即当代中国之缩影的宏观鸟瞰，完成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时代变革的整体性记录。但由于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使得《新星》与《京都》事实上成了两部具有根本不同文化价值指向的作品，从而也使得两部作品中的同一个“李向

南”，由于置身截然不同的环境而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规定性。

《新星》原题作《古陵》，给人以某种富于幽深寄寓的意味，也恰好能构成《京都》的对照。不管是《新星》还是《京都》，其意向都不在某个人物的塑造，而在综合性社会现实的扫描。之所以会有人把《新星》误读为一部性格小说，并由此出发指责《京都》人物塑造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于小说标题的改动，而应该说同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这种小说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其说源于作者不够清醒的创作动机，不如说是因为《新星》所需要面对的“古陵社会”。这是一幅相当典型的中世纪东方农业文明的风俗画。这样的生活结构、社会心态和人的素质，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英雄、对拯救者的呼唤与渴望。要忠实地揭示这种社会的内在底蕴，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英雄降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李向南”选择“古陵社会”作为展现自己理想追求的舞台的同时，“古陵社会”也选择了“李向南”，选择他做自己的“星”。这种选择赋予“李向南”以不可推卸的神异光彩。作为一个选择者，他怀抱某种近代启蒙性的民主自由梦想；作为一个被选择者，他必须坚持一种非近代性的工具性手段，并由此影响到价值关怀目标本身。传统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和近代人道主义观念追求，在这里产生了奇妙的混合。这种理想追求是切合“古陵社会”的，由此他成了英雄，成了生活的重心和小说的聚光点。脱离具体环境，指责其非近代性，甚至指责其非现代性，是不公平的。即使不想写一部性格小说，你也不能不承认年轻县委书记在结构经营中的特殊分量。当然，成功的创作者，应该努力在更高层次上，清醒地揭示这种生活自身的逻辑，而非仅仅朦胧地感觉到它或完全消极地受制于它。

《京都》第三部《灭与生》据说将安排“李向南”去搞哲学研究。就李本身看，踏入京都社会后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恰因此，他成了一个很不相同的艺术形象。因为生活变了，这里似乎不再需要一个拯救者，这里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也就没有中心了。

在这种新的参照系统中，不仅“李向南”身上那传统社会赋予的圣贤素质，而且那近代型的英雄主义，都成为似乎可笑的了。如果说在古陵是

由于对现实的超越而碰壁、而失败、而悲剧，那么在京都则由于落后于现实而显得不合时宜。

“李向南”在无望地挣扎。

他出入一个又一个高级沙龙，周旋于高层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青年改革家、商人、艺术家之类的精英中间，既不能居高临下，又不愿融入其间。他那拯救者的表现欲，却因环境的刺激而有增无减。可我们发现，“李向南”的救世欲望在古陵还可以表现为计划，到了京都，就只能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昼梦了。

“李向南”的救世之梦必然破灭。

新星的陨落势所必然。

政治角力的失败与生命存在本身的巨大灾难，构成了他摒弃救世狂想的双重契机。

到张承志笔下，“他”变得阴郁而沉默。这个傲慢地走出喧嚣都市、无名无姓的汉子，无疑是一个痛苦的逃避者，一个到荒寂的戈壁、青草、白泉间寻找安慰的逃避者。

“李向南”式的救世精神，在现实的锤打剥蚀下显然是萎缩了，面对生活“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但依然保持着优越感，一种不屑与庸常为伍的奇突倔强。那伴随清醒理智感而又无法割舍的梦想，深深植根于心灵深处，已化作了生命，化作了血肉的一部分，保留固然可笑，舍弃甚至会更凄惨。你显然是一个注定要在无望的绝境中顽强希望的精灵。幼稚，简单，偏激，不深刻，但沸腾的赤子之心却构成了一切肉欲杀机，一切老谋深算、精巧练达的最大嘲弄。精神自足的求索取代了俗世也即所谓现实的考虑，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构成了全部存在光辉的源泉。一支信仰之歌，同时又是一支理想消解的挽歌，一曲英雄末路的自我安慰之歌。

《绿夜》里的“我”借助对“小奥云娜”的回忆来建造心中的金字塔，来阻击蜂窝煤、烂西红柿和侏乙己、表弟们充斥着的生活。但就连这隐秘角落里的圣洁也难免被玷污。这个巨大又渺小、矜持却怯懦的探求者，于是排除各种障碍，依循性灵的呼唤，逃开卑鄙无耻却强硬有力的生

活大潮，向专属自己的圣地驶去。可那被神明样供奉在心中的“小奥云娜”，结果却与一般蒙古族女人没有任何两样。是的，她没有义务为我的梦而坚守童年的纯真、童年的美丽。生活就是这样真实而严峻。喧嚣骚动的京都不需要一个拯救者，蒙古草原上的女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轨道。

“我”可以失望，可以感受咀嚼幻灭的痛苦，生活却依然平静正常。“我”必须努力学会重新理解生活。

这种精神的华彩在《金牧场》中得到了另一次更完美的爆发。幼稚、虚幻的理想寻求，却铺排出了英勇卓绝、坚忍不拔的生命之歌，但不论多么宏壮辉煌，多么感天动地，却只能是英雄没落的叹息，是落伍者搁浅的自怜。

“李向南”式的救世者，纵不免唐·吉诃德样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的傻瓜相，却多少还残留了点改造现实、创造生活的英雄气概，还能激发人们哂笑之余的某种尊敬。张承志笔下的勇士，尽管都被描写成体格健壮、意志刚强的硬汉，尽管常被放到凶狠的自然暴虐中去表现崇高的征服壮举，却最终掩蔽不去败退者的凄清。但无论如何，“他”起码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汉子，“他”的精神还保留有最后的高贵。这个坚忍着生活苦难的汉子，是一个退避者，同时又是一个胜利者。

“他”的退避是与反抗结合着的，本质上有别于对生活的投降。由于其历史合理性受到挑战，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在现实领域已经找不到立身之地了，因此主人公的退避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维护形式。维护方式的消极性，导源于维护对象，更恰当地说是维护对象的命运的消极性。

徐星的歌唱构成了我们心灵追踪里程的第三个环节。这同样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流浪者。“他”就在人海之中，就在都市街头。“他”不再热血沸腾、双目圆睁、充满力度，不再虽九死其犹未悔，而是睡眼惺忪、懵懵懂懂，竭力对一切做无所谓状，甚至想去疯人院里摸着肚皮晒太阳。

一次又一次的反扑都被粉碎了，剩下的仅仅是刻骨铭心的疲倦。没力气再傲慢，没力气再希望，只想倒在女人怀里长眠不起。在强大的敌对性现实面前，你体验了自己的虚无。“如果我明天死了，会有什么反响呢？”

有外在的强大的推搡压挤，更有内在心灵之狱的钳制，你无法行动，不仅因为对象，而且因为理想本身。对立如此尖锐，力量又是如此悬殊，任何一种突入的尝试，或许都将蜕变为卑鄙的投降和对理想的不能容忍的亵渎。生活汹涌远去，你的理想无力驾驭任何有效的实践，只能无声地堵塞青春生命力的喷发。它不能造就任何合乎它要求的现实行动，于是干脆杜绝一切行动的可能性。是生活太可恶了？还是理想太可怜了？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你全部的能量都用于消解这些奔突的能量本身，尽管无所事事，却已疲惫不堪。

你认识到了这种理想、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可挽救，于是你嘲笑一切，你对一切都不在乎。但这恰恰揭示了你无可奈何的绝望。所有那一切都已深入骨髓，它们注定要把你引向最后的祭台。你嘲笑这一切，痛骂这一切，仅仅因为你不能容忍丝毫的欺骗和盗用。而在这样的生活中，神圣被彻底工具化乃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于是你愤愤然，你只能一把大火焚毁一切。既然不能卫护她的圣洁，那就不如干脆毁灭她的存在。挚爱到痛恨的痴情呵！没有救世的辉煌，没有傲世的冷峻，有的只是愤世的酸涩。价值理想观念对于人生是那样一种基始性的建构，以致任何一层进一步的剥离都将承受炼狱般的熬煎。

《饥饿的老鼠》与《剩下的都属于你》等作品，贯穿了与《无主题变奏》相同的主题。“李泗”浑浑噩噩，却不愿街头的小姑娘像自己一样“走下坡路”。“我”为生活的不公平牢骚满腹，自叹自怜，为性的焦渴昏头涨脑，胡说八道，真的面对“倒贴”的妓女时，仍不能遏制心灵深处那根弦的颤动，不能不掉头而去。

渴望彻底挣脱既有价值理想观念的羁绊，事实上在感情深处又难以割舍的心态，在与《无主题变奏》几乎同时轰动文坛的《你别无选择》中有更明确的表露。尽管认识到贝多芬式的英雄主题已不属于这个时代，追求现代性的“森森”依然为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朱庇特C大调交响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可无论如何，这种既有价值观念体系的挣扎，毕竟已堕入末路，已是黯然无光的夕阳残照了。它距离最后的毁灭，已不是很远了。既然这种价

值观念体系已被与世俗的虚伪放在一起嘲弄，那么，一旦感情上隐忍的难以割舍的凄楚随着时间的延续和事实的磨砺而变得麻木、模糊，心态感觉上质的嬗变也就只是举手之劳了。

王朔小说，无疑代表着典型的反叛精神和虚无主义的先锋意识，但确乎又在被作为娱乐性文学消费。愤世与媚世仅一步之差，这就是辩证法。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诞生，意味着对现有价值伦理尺度、现有意义观念体系的终极性否定，从而明确了当代文化精神与传统决裂过程中的悲剧性流向。无价值关心，无精神理想引导的抗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能导向完全破坏性的恶棍意识，导向以个体瞬时感官快乐为最后价值评定标准的流氓哲学。

从“李向南”到张承志笔下孤独的硬汉，进行的是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剥离，而在“无主题”的游荡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进一步摆脱自由、尊严、爱情等似乎闪光的重负的无效努力，王朔，则终于找到了这种无效努力的有效成果。那追寻的精灵，终于砸碎了使自己进退维谷、不知所措而又疲惫不堪的心灵枷锁，砸碎了那些似已不合时宜的顾虑规范，抛开了所有战栗、迷惘、寻找和忧伤。

“我”与“老Q”和“张明”与“吴迪”性爱关系的比较，可以清楚地透视两种不同的行为哲学和精神心态，映射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际组合方式。“张明”，恰像他自己所扬言的，“爱”常常挂在嘴边，仅仅因为它像“庇”一样顺口。“张明”鄙夷的，已非价值、意义、爱的世俗虚伪性，而是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观念本身。小说的叙述为照顾社会公众的自尊心，不能不略加涂饰，缀上几缕轻薄的忏悔。可稍加留心，即不难发现洋溢终篇的炫耀感。主人公为自己奸淫、抢劫、诈骗的老到自如、炉火纯青而自鸣得意、津津乐道。很难说这种态度以什么肯定形式的价值观念为根据，却可以断言，它以否定的形式宣泄了对人类全部既有精神情感思维活动的规范框架的最大蔑视。

如果说“我”与“老Q”的矛盾冲突，体现的其实是“我”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人的自我割裂，那么，“吴迪”的悲剧，也基本上是一个自我

毁灭的悲剧。它远非一个关于受骗上当的俗套故事。“张明”吸引“吴迪”、打动“吴迪”、征服“吴迪”的东西，正是那些必然毁灭“吴迪”的东西。不是某种涂饰，而是赤裸裸的罪恶存在本身，构成了惊心动魄的魅力。在和一百个女人睡过觉后面的，在老枪后面的，在嫖娼、抢劫、绑票后面的，不是恐惧不安，也不是粗鲁无知，而是清醒理性洞察下对既有价值伦理意识义无反顾的摒弃，以及由此而来的理直气壮。这恰恰是“吴迪”精神上所渴求的。恰恰因为“张明”在玩弄“吴迪”并必然抛弃她，“吴迪”才会对他如此着迷。手段与目的可以是异质的，甚至是敌对的，这种历史展开的痛苦扭曲地体现在个体身上时，后果必然是严重的。“吴迪”的存在与其渴求间的断裂是深刻的，她无法爱一个循规蹈矩的圈内人，却又无法不去做一个圈内人才感兴趣的贤妻良母。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无价值无意义存在，却又不能容忍一个有价值意义框框切割的世界。或许，她的最大错误在于，误把自己对世俗价值关怀的虚伪性的痛恶，当作了对价值关怀本身的痛恶。

“张明”身上，再也没有那种疲惫的叹息、呻吟。充斥字里行间的，是决绝行动的生命力的激荡，是没有畏怯的冒险拼刺。无所事事的局外人让位于混迹江湖的行动者，自我内耗的心灵之枷已然砸断，却付出了牺牲人的全部精神性关切、全部理想价值内涵的代价。剩下的，仅当下此在的感性存在的一元世界。没有归宿的概念，不需要家园的温暖，需要的仅仅是感性的刺激、感性的发泄和感性的快乐。不爱任何人，也不要任何人爱。上帝死了，什么都可以做。这种行为哲学在《顽主》中也获得了称扬。“三T”公司服务宗旨的前提即在于，认为感性适足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准则。由此，一切禁忌准则皆可弃置不顾。谈恋爱可以代替。夫妻吵架可以代替。自然，做爱性交亦可请人代替。

这种行为哲学的现实层面的效应，必然是造就各种高低不一、大小各异的恶棍，造就一批无任何终极性人类关切的政治、文化与生活流氓。这种从实践效应层面切入的特点，也决定了王朔小说与一般先锋文学的分野及其混迹于通俗文学的特殊可能性。

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畸形的历史，因而也是艰辛的历史。